

## 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费念慈批校考述

张海峰

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经李芝绶、恽积勋、费念慈递藏的瞿氏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该本是光绪五年（1879）刻本，卷前钤“静补斋”、“恽未畚”两方朱印。卷内有费念慈数十条批校，墨笔写成。卷一又有数处朱笔校语，为校勘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作，笔迹与费念慈校语不同，不知何人所校。

费念慈（1855—1905），字杞怀，号西蠡，江苏武进人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殿试二甲第六名。张惟骧《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》有传。费念慈家资雄厚，于金石字画、古籍善本颇多收藏，因收藏宋人左建《江林归牧图》，而署其藏书楼为“归牧堂”，“先后收有顾麟士、黄书琳、孙星衍、管礼庚等家的旧藏之本。去世后，藏书部分被傅增湘收购”<sup>①</sup>。精于版本之学，翁同龢曾称赞说：“费杞怀谈旧本书极博雅。”<sup>②</sup>又“擅书法，着笔坚凝卓绝，独冠于时，尤其是小楷近赵孟頫，写得更为出色，从妩媚中可以看出刚劲之姿，时人争欲收藏。”<sup>③</sup>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中费氏校语即用小楷书写，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。

“静补斋”，是李芝绶之藏书印。李芝绶（1813—1893），原名蔚宗，字申兰，又作升兰，号诚斋，江苏常熟人。道光十九年（1839）举人。藏书处名为“静补斋”，编有《静补斋书目》。李芝绶与瞿氏同里，过从甚密，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云：“又在瞿濬之丈坐中见李申兰先生，须眉庞古，神观矍铄。”

“恽未畚”，是恽积勋之藏书印。恽积勋（1857—1902），原名宝书，字叔畚，号筠孙，又号碧香居士，江苏阳湖人。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恩科经魁。光绪二十三年与陶湘等人在上海创立《译书公会报》。《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》有传<sup>④</sup>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多次记载与费念慈、恽积勋聚会，可见恽积勋与费念慈联系比较紧密。恽积勋曾经在1897年赠给费念慈三部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寄存在缪荃孙处，费念慈致函缪荃孙提到此事：“《瞿目》，叔畚告舍侄彝训，赠侍

①李玉安、黄正雨编：《中国藏书家通典》，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723页。

②《翁同龢日记》“光绪十七年二月十二日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，第5册，第2431页。

③《常州市志》卷五十一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917页。

④吴仁安：《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482页。

三部,皆在尊处,原信奉阅。”<sup>①</sup>此本或许就是恽积勋所赠三部之一。

书中校语为费念慈所书,有三条证据:

1.念慈按,宋巾箱单注诸经,所见十行九行八行各本,此为最小,当是婺刻也。(卷四叶七“《礼记》五卷,宋刊残本”条)

“念慈”,当是指费念慈。

2.《间气集》,述古堂藏景宋本,载《敏求记》。庚寅春,从梁节龛前辈鼎芬假得毛子晋抄本,倩金缉甫景写上版。毛氏得此卷时已在其所刻三次校改之后,抄而未刻,余为补其憾矣。义门此本择校数字,未能详也。(卷二十三叶五“《中兴间气集》二卷,校宋本”条)

“余为补其憾矣”,是指毛晋刊刻《中兴间气集》时以明刊本为底本,尚未得此抄本,因有遗憾,费念慈于光绪十九年(1893)影刻汲古阁景宋本《中兴间气集》,弥补了毛晋刻书之遗憾。

3.求赤手校本尚有《柳集》,亦依宋槧校,今在余家。己丑冬于常熟戴植卿书铺买得,同日得毛绶万校《元白长庆集》,据宋槧校于马调元本上。(卷十九叶二十七“《昌黎先生文集》四十卷《外集》十卷,校宋本”条)

费念慈致缪荃孙函叙此事更详:“弟近日得宋婺州五经正文、元印本《玉海》,皆申甫之物。又于常熟得宋刻《昌黎集》前缺诗十卷,自十卷至末皆有,澹生堂藏本,今从张芙川家出也。又有元刻《宋史》,亦芙川家物,据云无修板,尚未来,书估颇居奇,奈何?又得钱求赤手校《韩》、《柳集》,甚精,《韩集》用宋吴汝明本校,《柳集》用韩醇本校。又得毛绶万子晋从子依宋本校《元白长庆集》,毛室之藏书,则张仁卿代购也。”<sup>②</sup>据校语“己丑冬”,可以推知该信的具体时间为光绪十五年(1889),费念慈除了购得钱求赤手校本《柳宗元集》和毛绶万校《元白长庆集》外,还购得钱求赤手校《昌黎先生文集》。瞿氏所藏《昌黎先生文集》是“钱求赤校本传录于明刻本上”,系过录本,费念慈购得钱求赤手校原本,更为珍贵。

综而观之,校语内容涉及两个主要的方面。

### 一、记录费念慈经眼瞿氏藏书的信息

费念慈与铁琴铜剑楼第四代主人瞿启甲的交往,当始于1897年,费念慈致函缪荃孙:“礼卿所言不误,瞿氏书小种可抄,当遣人往耳。兄如欲往观,当约张仁卿,非此老不可。弟到彼在三月望后,能以此时来否?……弟今年秋间亦当

<sup>①</sup>顾廷龙校阅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,第391页。按,该信年代考辨见后。

<sup>②</sup>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72-373页。

送考到彼,兼至鄂祝南皮师赐寿。南皮官册是今年六十。”<sup>①</sup>又一函:“吾哥场后能到苏否?可同至罟里观书,已约定张仁卿矣。”<sup>②</sup>由函可知,费念慈从蒯光典(字礼卿)处得知瞿氏允许抄书的规定,而欲观瞿氏藏书则要通过张瑛<sup>③</sup>介绍方可,知此时费念慈与瞿启甲可能并不相识。自从1897年费念慈通过张瑛观书铁琴铜剑楼之后,因费念慈是地方名人,精于古籍版本、金石字画,又收藏颇丰,因而与瞿启甲的联系就比较紧密了,而且颇受礼遇。瞿启甲辑《前明常熟瞿氏四代忠贤遗像》收录费念慈题记:“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九日与翁相国师、赵次公丈同谒忠宣公墓。次日,至罟里拜瞻遗像。谨记。费念慈。”<sup>④</sup>费念慈既见重于瞿启甲,因而不仅可以观览铁琴铜剑楼藏书,还能借阅并影刻瞿氏插架之宋元善本,并题记于其上。

《历史文献》第十二辑载有费念慈致瞿启甲信函二十四通,其中有两函提到了费念慈参观瞿氏藏书之事。“两日纵观邨架,益我神智不少,眼福岂有既耶。”<sup>⑤</sup>“棹舟小泊,得接清谈,获窥秘笈,欣幸无似。议刻丛书,附上一目,择其轻而易举者,共十二种,借钞尊架八种,容三月中面商也。附书目,《归牧盒丛书》:第一集,《大戴礼记》元嘉兴路学官刘贞刊本、《尔雅》宋刊本、《孝经》景宋相台岳氏本、《论语》元刊本白文无注;第二集,《东家杂记》宋刊本、《离骚集传》宋刊本、《酒经》宋刊本、《鬼遗方》宋刊本;第三集,《白氏讽谏》传是楼景宋本已刻、《中兴间气集》汲古阁景宋本已刻、《联珠集》宋刊本、《芦川词》宋刊本。”<sup>⑥</sup>费念慈拟集宋元善本汇刻《归牧盒丛书》,共三集十二种,此前已刊刻《白氏讽谏》和《中兴间气集》两种,其他十种,费念慈欲向瞿启甲借八种。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可知此八种为:《尔雅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东家杂记》、《离骚集传》、《酒经》、《鬼遗方》、《芦川词》。费念慈致瞿启甲函中,多次提到借阅宋刊本《离骚集传》,并请人影刻之事。费念慈不仅借到了《离骚集

①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88页。按,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八月十二日,张之洞(南皮)有《六十生辰恭谢皇太后恩赏折》、《六十生辰恭谢皇上恩赏折》(《张文襄公奏议》卷七十一),可知本年张之洞官年六十。费念慈此札中还有“今年是考差年分”(第386页)、“弟今年秋间亦当送考到彼”等语,是知该年为乡试之年,光绪二十三年恰是丁酉科,可知此札写于光绪二十三年。

②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91页。前面所述恽叔畲赠费念慈三部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事,与此为同一封信。

③张瑛(1823-1901),字仁卿,为瞿镛表外甥,参与校订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并撰写后序。

④瞿启甲辑:《前明常熟瞿氏四代忠贤遗像》,1920年。《翁同龢日记》亦记此事:“与费纪怀登高,拜瞿忠宣墓。”

⑤李焯整理:《费念慈致瞿启甲信札》第22函,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:《历史文献》第十二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第212页。

⑥《费念慈致瞿启甲信札》第1函,《历史文献》第十二辑,第204-205页。

传》，并且写题记于卷前：“光绪辛丑正月武进费念慈借观，景副校藏，八月十九日记。”钤“西蠡”印<sup>①</sup>。然不知何故，《离骚集传》等各书均未见刊布。

费念慈将观阅瞿氏藏书的具体情况，记载在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之上，共6条：

1. 已佚失。（卷三叶七“《诗集传》二十卷，校宋本”条）

2. 乱后佚失。（卷十九叶四“《曹子建集》十卷，宋刊本”条）

3. 乱后佚失。赵次公宗建旧山楼藏一宋刊本。（卷二十三叶六“《窦氏联珠集》一册，宋刊本”条）

瞿氏藏书由于战火等各种原因，藏书散失数量也很惊人，张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后序称：“因思瞿氏四世以来，收藏釐订，代有替人，中更兵燹、波涛之险，其书十亡六七，其《目》幸而获存。”费念慈依照该《目录》观书时，遇有佚失之书，便标注于书目之上，并且标注了瞿氏佚失的《窦氏联珠集》藏赵宗建旧山楼这一重要信息。

赵宗建（1828-1900），字次侯，晚号次公，江苏常熟人。翁同龢《清故太常寺博士赵君墓志》称其“殷四壁，善鉴别金石图书”，藏书处曰“旧山楼”，有《旧山楼书目》传世，《藏书纪事诗》有传。费念慈跋赵宗建藏明抄本《太平御览》云：“旧山楼，赵次公宗建山居也，在虞山破山寺前，藏图书金石甚富……得宋本《窦氏联珠集》，筑小阁，榜曰联珠。长髯野服，终岁不入城市，自号非昔居士。所藏尚有南宋馆阁写本《太宗实录》，亦士礼居物也。”<sup>②</sup>赵宗建以“联珠”命名其所筑阁楼，可见对《窦氏联珠集》极为重视，赵宗建《旧山楼藏书记》记载了得到《窦氏联珠集》的经过：“此书归士礼居，后为吾邑庞昆圃所得，由庞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，遭庚申之变，不知何时流落于外。阅二十年，忽见于书贾之手，遂为予所得。镂版之精，宋槧中亦不多见……予藏书以此为压卷。”<sup>③</sup>据此可知赵氏藏《窦氏联珠集》确系瞿氏旧物。此本后被缪荃孙收得，缪荃孙记：“阳山顾大有旧物，归叶氏，后入士礼居黄氏、艺芸书舍汪氏、常熟瞿氏、赵氏，今归余插架。”后来又转手他人：“宋本归他氏，影摹一册，聊以自娱，堯圃旧例。”<sup>④</sup>后归刘承幹，印入《四部丛刊三编》。该书现藏国家图书馆。

4. 《礼记》一卷宋刊残本，存《投壶》、《儒行》二篇，每半页八行，行十六字，板心不及三寸，阔不及二寸，雕缕甚精。念慈按，宋巾箱单注诸经，所见十行九行八行各本，此为最小，当是婺刻也。（卷四叶七“《礼记》五卷，宋刊残本”条）

①此本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，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。费跋瞿良士辑入《铁琴铜剑楼藏书记跋集录》。

②转引自王欣夫：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701页。

③赵宗建：《旧山楼书目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，第77页。

④缪荃孙：《艺风藏书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380、529页。

按,此巾箱本《礼记》一卷残本,在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中并未单独立目,而是附录于宋刊残本《礼记》五卷之后,曰:“又有《礼记》单注残宋本一册,附‘释音’、‘重言’,当是南宋书林所刻,仅存《投壶》、《儒行》两篇,册长三寸,宽两寸馀,每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注双行,亦十六字。书中慎字皆缺笔……古本之资考证者,虽残璋断珪,亦可宝也。”该本附“重言”,是南宋书坊刻本的典型特征,瞿镛定为南宋书林本。费念慈认为是婺州刻巾箱本。

5.集后附刻杨仲宏所撰行状,前两页行楷书,仲穆所写也。(卷二十二叶五“《松雪斋文集》十卷《外集》一卷,元刊本”条)

仲穆,为赵孟頫之子赵雍(1290-1371)字,赵雍深得其父和母亲管道升的真传,在书法和绘画两方面都卓有成就。费念慈亦好此道,识得《松雪斋文集》中所附《赵孟頫行状》为赵雍手写上版,特为批注,以示珍重。

6.义门此本择校数字,未能详也。(卷二十三叶五“《中兴间气集》二卷,校宋本”条)

按,该条校语已详见前。瞿氏藏《中兴间气集》是何焯手校本,何焯校语曰:“康熙戊戌十月望,以事往南海淀,借宿蒋西谷寓舍,架上有抄本唐《中兴间气集》一册,视其行数、字数,似从宋雕影写,问之,乃述古堂故物也。因借归,呵冻是正,遂成善本。”何焯所据之本是述古堂影宋抄本,而费念慈光绪十九年(1893)所刊《中兴间气集》所据底本是毛晋影宋抄本,二者底本不同。费念慈据自己所刊之本,认为何焯并没有通校《中兴间气集》,只是“择校数字”,恐有偏颇。

## 二、标注费念慈知见宋元善本的情况

费念慈在阅读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时,将部分宋元善本信息标注在相关书目之上。这些知见信息涉及了缪荃孙、盛昱、李盛铎、赵宗建、刘春璋等多位学者的藏书,可补多种古籍递藏信息之不足,现抄录于下:

1.绍兴监本注疏所见凡四本:一此本;一《礼记疏》,伯希所藏;一《周官》残疏,木斋所藏,一《尚书疏》,樵野所藏。(卷一叶三“《周易注疏》十三卷,宋刊本”条)

2.惠氏所见宋刊正义八行本,孔氏微波榭所藏,今归伯希前辈。李木斋同年藏八行本《周礼疏》半部。张樵野侍郎有八行本《尚书注疏》。(卷四叶十“《礼记》五卷,宋刊残本”条)

两条校语记录的对象是相同的,内容互补,所提四部经书,即我们现在所称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《周易注疏》十三卷、南宋绍熙三年(1192)黄唐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、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《周礼疏》五十卷、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。北宋刊印诸经,皆为经、注、疏单行,直到南宋初年绍兴间,才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将经、注、疏文首次合刻,以上四书实是各经的首次经、注、疏的合刻本,行款皆为半叶八行,俗称“越刊八行本”、“两浙东路茶盐司本”,王

国维《两浙古本考》、长泽规矩也《越刊八行本注疏考》、李致忠《宋版书叙录》皆有考证。李致忠先生认为“《礼记》注疏是由黄唐主持刊刻于南宋绍熙年间的两浙东路茶盐司公署,而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注疏则是南宋初年两浙东路茶盐司的旧刊,远比《礼记》的刊刻要早,且与黄唐无关”<sup>①</sup>。费念慈无疑是较早关注南宋初年两浙东路刊印诸经版本的学者,而且对于这四经版本的判断是比较准确的<sup>②</sup>。数年以后,傅增湘经眼瞿氏藏《周易注疏》时同样以此四本并称,曰:“此与袁抱存克文藏《礼记》、张香涛之洞藏《书经》、李木斋盛铎藏《周礼》同,皆绍熙黄唐刻本也。”<sup>③</sup>

伯希,盛昱(1850-1899)之字。盛昱富于收藏,度金石书画之室曰“郁华阁”,所藏以宋本《礼记》、《寒食帖》、习光胤《牡丹图》最精,称为“三友”,校语所提《礼记正义》即是“三友”之一。据阮元《礼记注疏校勘记序》,该本《礼记正义》“出于吴中吴泰来家,乾隆间,惠栋用以校汲古阁本。其真本今藏曲阜孔氏”,此即费念慈所说“惠氏所见宋刊正义八行本,孔氏微波榭所藏”。该本《礼记正义》是盛昱从琉璃厂购入,缪荃孙《琉璃厂书肆后记》:“伯希辞官以后,探得打磨厂兴隆店外来书贾货车萃焉,五更开市,各书陈列于地,论堆估值,厂友悉趋之,伯希时时褻被忘宿,遂得宋本七十卷之《礼记注疏》、《杜诗黄鹤注》、旧钞《儒学警悟》。”<sup>④</sup>该书后归袁克文,又归潘宗周,潘氏“宝礼堂”即因此书而得名,现藏国家图书馆。

木斋,李盛铎(1858-1937)之号。李盛铎是光绪十五年(1889)榜眼,与费念慈同年。《李木斋友朋书札》有费念慈致李盛铎三函,一函曰:“昨多輶褻为歉。承惠《易雅》,感匪可罄。内人久病,思借《石头记》藉以养病,当荷许我,乞发交去人为幸。”<sup>⑤</sup>据信内容,可知二人交往密切。费念慈致函缪荃孙也提到二人交往之事,曰:“弟已有七经,木斋以《易疏》见赠。”<sup>⑥</sup>李盛铎藏书甚富,残本《周礼疏》是其插架珍品之一,仅存卷一至卷二,卷一三至一四,卷二七至四七,卷四九至卷五十,李盛铎曰:“此书正文与《六经正误》所引注疏本合,即绍兴壬子修补之本也。”<sup>⑦</sup>该本后与李盛铎木犀轩其他藏书一并售予北京大学。

樵野,张荫桓(1837-1900)字,广东南海人。历任总理衙门行走、户部左侍

①李致忠:《宋版书叙录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4年,第14页。

②按,《礼记正义》,费念慈校语说“绍兴监本”,当是统称。费念慈致函缪荃孙称该书为“绍熙本”,“《尔雅小笺》第一册,乞并所写副发还,即持易绍熙本《礼记》”(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67页)。该本《礼记正义》卷末镌有“绍熙辛亥仲冬……壬子秋三月,三山黄唐谨识”跋,版刻时间非常明确,费念慈当不会致误。

③傅增湘: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10页。

④孙殿起:《琉璃厂小志》,北京出版社,1982年,第95页。

⑤曾庸整理:《李木斋友朋书札》,《历史文献》第七辑,第182页。

⑥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第367页。

⑦李盛铎著,张玉范整理: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5年,第70页。

郎兼管钱法三库,赏尚书衔。张荫桓掌管外交、财政大权,并参与清政府中枢决策,权势不亚于李鸿章。“张荫桓虽出身捐班,却才华横溢,工诗词,富收藏,常与翁同龢、王懿荣、李文田等科举正途出身者相唱和,著有《铁画楼诗文稿》六卷、《铁画楼诗续钞》两卷传世”<sup>①</sup>。据《翁同龢日记》,张荫桓与翁同龢交往甚密,除了讨论国事,常常交流收藏。而费念慈也是翁同龢家中的常客,二人或有关于藏书交流。校语所述《尚书正义》,卷前有杨守敬跋,称光绪十年(1884)杨守敬重金购于日本,光绪二十三年邻苏园杨守敬自刊本《日本访书志》收录该书,并注曰:“此书今归南皮张制府。”傅增湘亦称在张之洞家见过此书<sup>②</sup>,与杨守敬注相合。费念慈1897年才登铁琴铜剑楼观书,此批注当晚于《日本访书志》刊印之时,或此本《尚书正义》先归张之洞,后归张荫桓。该本《尚书正义》现藏国家图书馆,卷中并无张之洞、张荫桓印记,费念慈批语可补该本递藏信息之不足。

3.汲古阁藏宋刊本,后归五砚楼者,今在伯希前辈盛昱家。(卷十九叶十七“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二十五卷附《文集》二卷,元刊本”条)

盛昱所藏当是指《黄氏补千家诗注纪年杜工部诗史》三十六卷,此书亦是盛昱从琉璃厂购得,说已见上。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详记该书,书中钤有“虞山毛晋”、“五砚楼”、“浦祺之印”等印,与费念慈所言合。傅增湘注曰:“盛昱遗书,为袁寒云收得。”<sup>③</sup>知该书后归袁克文,今藏山东省博物馆。盛昱与费念慈都富于收藏,经常一起品鉴各自的藏品,《翁同龢日记》多有记载,例如光绪十七年(1891)三月初八,翁同龢“晚赴伯羲、莲生、杞怀三君招,看字画,在伯羲家。东坡《寒食帖》、赵临《十七帖》、赵行书、晦翁诗卷”<sup>④</sup>,由此可见,盛昱郁华阁所藏精品多为费念慈所知。

4.缪炎之前辈荃孙藏本无缺卷,是杨惺吾得之日本,昨在京师尝假校一过。赵次公藏《荀子》,汲古阁中物,每册有毛奏叔印,板式行字与此同。(卷四叶一“《周礼注》六卷,宋刊残本”条)

费念慈与缪荃孙是亲戚,关系密切,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载有费念慈致缪荃孙书信148通,是二人学术交往的见证。《周礼注》十二卷,瞿氏所藏仅存六卷,缪荃孙藏本是全帙,《艺风藏书记》曰:“宋刊巾箱本,郑氏注,有重言无重意,刻印俱精。每半页九行,每行十七字。日本曼殊院旧藏,有印,白文。”<sup>⑤</sup>费念慈跋汪鸣銮所藏宋绍熙间闵刻《周礼》亦提及该本:“光绪壬辰闰六月,武进费念慈假读,校于士礼居黄氏本上。同时所见单注本:一为缪炎之前辈藏巾箱本,有重言无重意;一为传是楼藏纂图互注本,槧印绝精,为宗室伯羲前辈所得;一

①《张荫桓日记》前言,任青、马文忠整理:《张荫桓日记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4年。

②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1993年,第60页。

③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1029页。

④《翁同龢日记》第5册,第2436页。

⑤《艺风藏书记》,第9页。

为北宋婺州本,止存六卷,‘腊人’下疏语两条尚未衍入注,前明嘉靖间《三礼》合刻本所从出,章硕卿故物,今不知谁属矣;与此而四。”<sup>①</sup>杨守敬《日本访书志》记载了将此本转让缪荃孙的经过,曰:“江阴缪筱珊编修爱不释手,乃影摹一通,而以原本归之。”<sup>②</sup>

“赵次公藏《荀子》”,乃高正先生《荀子版本源流考》所说“李芝绶跋坊刻巾箱本”<sup>③</sup>,南宋孝宗时坊刻巾箱本,有李芝绶、杨沂孙、翁同龢跋,今藏国家图书馆。该书钤有“虞山毛表奏叔家图书”、“赵宗建印”等印,与费念慈所言“赵次公藏《荀子》,汲古阁中物”相合。

5.黎莼斋观察使日本时所景刻者绝精,以此校之,无纤悉不合。刘我山同年奉璋言家藏有余仁仲本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两注本,是端临先生所遗,汪孟慈太守所刻《公羊解诂》即从此本景写。(卷五叶四十一“《春秋穀梁传》六卷,宋刊残本”条)

“黎莼斋观察使日本时所景刻者”,指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影刻宋绍熙本《春秋穀梁传》十二卷附考异一卷,光绪九年(1883)年刊印,费念慈购得一部,叶昌炽曾借阅,“柬砑怀,借仿宋绍熙本《穀梁传》四册,黎莼斋星使在东瀛摹刊”<sup>④</sup>。

刘奉璋(1854-?),字志宜,号我山,江苏宝应人。光绪十五年(1889)进士,与费念慈同年。刘奉璋曾藏南宋绍熙年间余仁仲刊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十二卷、《春秋穀梁传》十二卷,不为他处所载。该本《春秋穀梁传》,国内仅见铁琴铜剑楼藏残帙,日本藏全帙,为黎庶昌《古逸丛书》所影刻。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见存两部,一藏铁琴铜剑楼;一即校语所说“汪孟慈太守所刻《公羊解诂》即从此本景写”之本,今藏国家图书馆。李盛铎跋该本曰:“汪孟慈太守别得《公羊》一本,付之景刊。汪藏原书兵燹以后沉晦已数十年,一旦忽见于京师,为寒云购得。”<sup>⑤</sup>但是袁克文也不是从刘奉璋手中购得,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称:“此建本之至精者,袁寒云得之李新吾。”<sup>⑥</sup>新吾是李经畬(1858-1935)之号,李瀚章长子,字伯雄,光绪十六年(1890)进士。是知该本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自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从汪喜孙(字孟慈)家流失以后,为刘奉璋所得,又归李经畬,再归袁克文。

6.南宋馆阁抄本,今藏赵次公许。(卷九叶二十“《宋太宗实录》八卷,钞本”条)

《宋太宗实录》八十卷,现仅有二十卷传世,一为瞿氏所藏清影宋抄本,存

①转引自《宋版书叙录》,第108页。

②杨守敬撰,张雷校点:《日本访书志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3年,第7页。

③高正:《荀子版本源流考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2年,第48页。

④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抄》“光绪十年二月十六日”,上海蟬隐庐石印本,1933年。

⑤《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》,第50页。

⑥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,第74页。

卷二十六至三十、卷七十六、七十九、八十，共八卷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曰：“黄氏得南宋时馆阁钞本，此从之传录。”一为校语所说赵宗建旧藏南宋理宗时馆阁抄本，存卷三十一至三十五、卷四十一至四十五、卷七十七、七十八，共十二卷，现存台湾“国家图书馆”，有钱大昕、翁同龢、费念慈、吴大澂跋，钤有“士礼居藏”、“汪士钟印”、“赵次公印”、“旧山楼秘笈”等印。翁同龢在赵氏旧山楼见过此宋抄本，“有宋钞《太宗实录》五册，士礼居物”<sup>①</sup>，卷中翁同龢跋，即是此时写入。费念慈在光绪二十一年见过该本，并跋于上。费念慈对该本非常重视，因而在跋赵宗建藏明抄本《太平御览》时又提及该书：“所藏尚有南宋馆阁写本《太宗实录》，亦士礼居物也。”吴大澂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见到该书，大喜之下，竟欲将其收藏的宋太宗铜押送与赵宗建，并题跋以为券，可见该书之珍贵。但该馆阁抄本《宋太宗实录》不见于《旧山楼书目》，可能编目时书已售出。赵宗建所藏十二卷后归张元济，张元济又借瞿氏所藏八卷清抄本，合印入《四部丛刊三编》。

### 三、其他校勘文字

此外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一叶一至四十三又有朱笔校勘，对文字作了仔细的校正和描润工作，文中的误字，朱笔改正于卷端上方；笔画不规范的字则以朱笔描润，使之更加规范，但笔迹不似费念慈。如此细致的校勘内容，令人怀疑朱笔校语的作者或许参加了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的校勘工作，在谈这个问题之前，首先要探究一下该书的版本问题。

一般认为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是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刻成，据笔者考察，该书目光绪五年就已经刻成，但是鲜有人提及。叶昌炽参加了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的校勘工作，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书目的校勘和刊刻情况。叶昌炽在光绪二年（1876）四月校勘史部，四月十六日记曰：“校恬裕楼书目<sup>②</sup>，余分得史部。”直到二十六日方才“校书目毕”。同年九月又校子部，十五日记：“终日校书，余分得子部。”连校四日方毕。光绪四年九月十三、十四日又记：“校瞿氏书目。”光绪五年闰三月初八日记：“复至漱艺斋刻字铺，见瞿氏新刊书目已成十七卷。”同月十九日：“校瞿氏书目终一卷。”五月十一日：“夜校瞿氏新刻书目。”<sup>③</sup>是知光绪五年五月，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就已经刻成。但是该本尚有不足，费念慈曾提及“罟里瞿氏书目尚须覆勘，内有空格未补。少迟觅寄。江阴新设南菁书院，掌教者为张梦彪先生文虎。九月廿七日”<sup>④</sup>。按，南菁书院建成于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据知此信写于该年，也就是说费念慈所见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是光绪五年刻本，该本“尚须覆勘，内有空格未补”。山东大学藏本

①《翁同龢日记》“光绪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第4册，第2309页。

②按《恬裕楼书目》即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瞿氏藏书处早年名曰“恬裕斋”。

③以上均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钞》卷一、卷二。

④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，第324页。

即是光绪五年本,该本正文与光绪二十四年本行款版式皆同,裂版位置相同,实属一版。但是通过对校可以发现,该本尚有一些墨丁,而光绪二十四年本则已做过修改,例如卷二十三叶十四第九行之墨丁,二十四年本改为“精”;叶三十第十行之墨丁,二十四年本改为“如”,这与费念慈“尚须覆勘,内有空格未补”的说法是相符的。由此可知,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光绪五年便刊刻完成,光绪二十四年本实际是其修订本<sup>①</sup>。

叶昌炽光绪五年有“夜校瞿氏新刻书目”之语,又据光绪二十四年本所附瞿启甲识语“于书之已付剞劂而间有谬讹者,重与诸名家商定其篇,悉加更正”,是知瞿氏为了保证质量,光绪五年版刻完成以后,又请叶昌炽等人进一步校勘,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方才正式印行。

朱笔校语的作者可能参加了此次校勘,光绪二十四年本的修订与朱笔校勘有吻合之处。例如卷一叶四、十六、十七、三十之“考”字,朱笔改为“攷”,二十四年本也改为“攷”。又如叶二十四“敕”,朱笔改作“勅”,二十四年本也改作“勅”。叶二十八“時”字偏旁误刻作“目”,朱笔改正,二十四年本亦改正。叶二十九“臧”,朱笔改为“藏”,二十四年刊本亦改为“藏”。

然亦有不合者。例如叶六“考”字,朱笔改作“攷”,二十四年本未改。叶九“壮”字,刻本右旁作“土”,朱笔校语作“壮,从士”,二十四年本未改。又如叶三十四“然泰之中否,否之中又有泰”,朱笔校语在“泰之中”后增“又有”二字,删“又有泰”之“有”字,并在页眉注:“脱去又有二字。”二十四年本未改。出于书法美观的角度,用朱笔描润修正的字,二十四年本亦未改,例如叶二十一至二十三中的“刊”字,叶二十四中的“跋”字等。

由于朱笔校语较少,可参照的笔迹也不多,其作者为何人尚无法认定,此人是否确实参加了二十四年本的修订工作,仅据以上相合之处,亦难定论。只得存疑,以待知者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特藏部

<sup>①</sup>《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》著录东北师大、黑龙江大学藏有咸丰七年本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二十四卷。“咸丰七年”的结论当是依据卷前咸丰七年宋翔凤序而做出,但是“咸丰七年本”的说法有待商榷。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光绪二十四年本所附张瑛序“长洲宋于庭先生为作书目序,书甫成,刊经部三卷,适遭咸丰庚申之难,板毁于兵”,可知咸丰七年仅刊经部三卷,后书板亦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。两校所藏既为二十四卷本,就不会是咸丰七年本。